

美學與教育的危機

譯維大陳 著夫羅恰岡



寺日モヤ山反片土系

美學與校育的危機

岡恰羅夫著 陳大維譯

時日祚出反叛土兵

Н. Гончаров

Кризис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ки в США

Перевод Чэн Да-вэй

Шанхай

Эксмо

1950



1950年10月初版
(4000册)

美國學校與教育的危機

編者
翻譯者

陳岡
時代
怡大
羅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一二四
電報掛號:二〇〇〇一

EPOCHNIPUBCO

總

社: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杭州分店:杭州延齡路一四一三號
電話:(5)一六六〇〇〇
電報掛號:五二五六一四四八八號
電報掛號:二二二一四一四八八號

一九一三年列寧在『論關於人民教育委員會的政策底問題』一篇文章裏指出，美國文盲佔着很高的百分比，尤其在黑人中間這個百分比更高。從那時到現在已經過了三十七年，在這個期間俄羅斯由技術上經濟上落後的國家一躍而成爲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變成了沒有文盲的國家，而在美國，教育事業却沒有得到改進。美國政府年年在加強着軍備競爭，這種政策使它的經濟困難更形增多，成爲人民的進步和文化發展底障礙。美國教育事業的衰退，連美國官方人士也不得不加以承認。例如，杜魯門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致國會的咨文中說：『值得引爲遺憾的是，像我們這樣富有的國家裏，竟使千百萬兒童得不到適當的校舍或足夠數目的中小學師資。』

杜魯門當時發表那篇宣言，目的純粹爲了煽動，因爲他企圖在大選中多獲選票。直到現在爲止，他尚未採取任何改進學校狀況底實際辦法。在這方面，美國總統却沒有表現出他那種表現在『援助』希臘反動勢力上的堅持性。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杜魯門

向大學生演講時，再度被迫承認：「我國國立學校的系統底財政狀況，對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來說，却是一種恥辱。」

在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美國軍費支出佔一百八十億美元，而教育費祇佔二億五千萬元，換言之，教育費較備戰費少七十二倍。在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度中，軍費支出佔國家預算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教育費則祇佔百分之一。就連這樣微小得可憐的撥款，其分配方法，絕大部份亦爲有特權的學校所攫得。在專爲資產階級子女而設立的紐約的特權學校裏，每班每年可領到六千元，而在密西西必州的學校裏則不到一百元。

* * *

美國民衆學校的教師們處境極端困難。在多數的鄉村中一位教師要教八班學生。在所有十六萬九千九百零五所初級學校中倒有十萬所是單元學制的，在那裏一位教師要教八班或六班。一位教師要從一年級教到八年級，當然是十分困難，這是很明白的。至於學生的眞實知識是談不到的。一位教師自然無法對自己的學生教給深入而寶貴的知識。

美國的進步教師們隨時隨地有遭受迫害的可能。祇要教師不到教堂去做禮拜，祇要他的脚步到過進步黨所召開的羣衆大會，他就會立刻被解除職務。檢舉「國家公務員的

忠誠」底法案，廣泛地應用於教師，所有一切「嫌疑份子」都要被解除教職。

關於教師們的物質情形和法律地位，取自美國文學中的事實就可加以說明。美國人葛列脫出了一本書叫「論紀律」，在書裏他寫着：「任何人當了教師，他的社會地位就降低一級，即使他是名門出身亦不能例外。」在一九三九年某期的「教育雜誌」裏可以讀到下列幾行：「醫生、職員或法學家，即使他們的腦筋像光滑的玻璃杯底表面一樣平坦，而連一點曲折都沒有，你却把他們位列在較高的社會階層，可是伴着教師的却永遠是不重要和卑賤底感覺。」美國事業家勞勃脫·李特爾在一篇叫做「教師的薪給使我民族蒙可恥的醜名」的文章裏寫道：「密士根是富有的州，但每年祇付給教師四百元，較付給倒垃圾者還少……。在三十個州裏教師的新金較國家機關裏的女傭要低得多。」

美國教師的物質困難情形迫使他們去尋找非教育性質的副業。當然，這樣對他們的教學品質會起不良的影響。下面就是一個典型的實例：密西西必州克維爾城的一位名叫郭林司的教師，在夏季不得不經營牙刷買賣來維持全家的生活。

在中等學校裏女教師佔百分之六十，在初級學校裏則佔百分之九十。關於美國女教師的情况，一九四七年五月份的「美國校務委員會雜誌」曾有下列的記載：「女教師沒

有享受養老金、懷孕的休假的權利。在許多地方，假若女教師嫁了人幸而不被趕出校外的話，那麼生了孩子做了母親之後，這就是一定不可避免的事了。」教育家梅·阿爾勃諾特教授在「教師是人」的一文裏指出說，在這樣地對待女教師的情形下，社會會失去許多寶貴的師資。這位教授根據實際材料證明，女教育家中間患神經病者，較其他職業的婦女要多得多。阿爾勃諾特聲稱：『凡一個健康的婦女，當她喪失有家庭，和養子育女的可能性，失去私生活的時候，她就不會有健全的神經。女教師中有許多抱獨身主義者並非出於自願。』在結論中梅·阿爾勃諾特說：『別忘教師是人，他們想要家庭，想要孩子，他們也想要幸福。』

在自誇為民主的國家裏，教師們就是這樣地生活着和工作着。當然，他們一有機會，就跑出學校，這是毫不足怪的。僅僅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五年就有三十五萬以上的教師脫離了學校。據「新聞週刊」雜誌估計，全國六萬班的學生都缺少師資。

美國反動派叫囂着說，美國的學校是非宗教的，是自由的。這與事實相差甚遠。在美國的學校裏，教育的內容在深度及準確性方面從未有何特色。教材是偽造的，是為向學生灌輸美國特殊歷史使命的思想而服務的。學校裏的宗教勢力愈來愈大。祇要指出美

國八百所大學中就有二百七十三所是全部屬於天主教組織的就够了。在這二百七十三所大學裏有十二萬八千八百四十四名大學生。天主教徒擁有二千二百三十五所中學和七千七百九十四所小學，合計有二百四十五萬以上的學生。

美國教育研究協會在「教育哲學」年鑑裏斷言，學生的知識，若不灌入宗教感情的話，則將成為有害無益的東西。有一位名叫威廉·麥高根的曾這樣寫過：「教堂認為宗教比微積分的知識還重要些……良好的道德教養比精通文法更重要些，培養一個好公民比能够欣賞莎士比亞的創作更重要些。在兒童中間擴展天主教的美德比其他一切都重要些。」

人民的愚昧無知永遠對資產階級有利。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帝國主義者要剝奪大量兒童有受任何教育的機會的原故。在美國有六百萬兒童被摒棄在學校的大門外。美國事業家所叫囂的「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是旨在愚弄人民的空洞的虛構。

據「學校與社會」雜誌證明，即連中等學校學生的知識亦是完全不及格。「中等學校裏有許多學生的閱讀及算術能力，只在初級學校的四年級和五年級程度的水平上，而且他們在專門學校裏進步緩慢，最主要原因之一是不善於閱讀。」

該雜誌在調查了南達柯大州各中等學校學生的知識之後，描述將在中學畢業的少年時說：「他們不會真正利用交際工具——閱讀、書信和簽字法……他們看不見因果的聯繫……他們智力上的興趣尚未發展……他們不能獨立地利用書本去工作……他們沒有或幾乎沒有一點實在的知識。」

在美國中等學校裏，教育的內容本質上既是反科學的，那麼少年們又怎能產生深刻智力興趣而提出問題來呢？

在美國學校的課程和教科書裏歪曲地講解着歷史的事實。在教科書裏，證明每一個美國人不論其地位如何，都有成為百萬富翁和大總統的可能。據說一切要靠個人的能力、堅持性和勤勞。當然，假若你打算在美國學校的教科書內去找階級鬥爭和勞資矛盾等問題的解釋，那就未免太幼稚了。像「公民」這種課程，在學校裏教的目標是為了培養學生的種族主義，培養對其他民族的憎恨。

壟斷資本把學校全部置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下，他利用學校來麻醉成長中的一代。「學校的危機」一書的作者大衛·列克斯這樣地描述美國學校的現在教育情況：「商人和金融家操縱着學校的教育。沒有一個美國學校敢把階級鬥爭，老闆與工人間鬥爭的真

實情形告訴學生。沒有一位教師敢向兒童們揭露真相，說在他們所居住的城市裏經常發生些多麼黑暗的社會事件。即使歷史教師和公民教師知道事實的真相，他們也得欺騙兒童，否則他們就會被免職……教科書的編著人員不得不寫謊言，掩蓋真理，歌頌戰爭，竟把億萬富翁捧出來當作民族英雄。」

要用沙文主義及種族主義的精神來教養年青的一代，必須先加緊對教師的思想教育。教師們僅許有『美國的思想方式』，而懷有比較進步思想的教師們却被迫出學校的大門外並被載入『黑名單』內。這一切是在叫喊個人自由和民主的呼聲中發生的。反動派這種瘋狂壓力不能不在教師們的政治見解上反映出來。美國女記者陶樂姍·基爾克胡德在『美國往何處去』一文裏寫道：『「民主」兩字現在掛在所有教師的口上。然而當你無法使這些教師去與黑人教師一起出席參加會議，當他們贊同私刑，一聽到大批屠殺黑人而感覺快活，當這些教師對於那充滿無神論的科學，不能加以適當評價，不懂得自己的思想敵人底觀點，當這些教師對於別國的文化成就，特別是對於俄國的文化與科學和法國文學的成就不能加以適當評價，當這些教師拒絕承認歐洲人民對世界文化的貢獻的時候，他們還能談些什麼民主，他們還能貫澈些什麼民主原則呢！？美國孩子誤解民主

的過失不應祇責備教師，還應責備那些付給教師微乎其微的薪金的人們，那些拿廉價的教師們看做經營煤炭買賣一般的人們，那些剝奪教師發表自己的見解的權利，迫害有進步思想的教師的人們。實際的情況離民主多麼遠，教師必須適應有利於高高在上的主子們，以便賺得每日需要的麵包。朝不保夕的無把握的生活是迫使教師們放棄自己理想的有力武器。』

目前對進步教師及進步教育事業家的迫害愈來愈厲害了。所有懷有進步思想的教師均被指為『破壞份子』。在紐約州頒佈的所謂『菲因貝爾格法案』中說到：『據報有破壞團體的會員混入本州各國立學校中服務……由於這些份子滲入國立學校的結果，那些教授兒童和指導兒童的人們在最純潔年齡的兒童中間將展開破壞宣傳。立法機關認為展開這種宣傳有實現的可能，而且還在學校裏實現得很巧妙，可使不被人所發覺。因此立法機關認為必須澈底實施禁止破壞團體的會員進入國立學校服務的各種法令。』

顯而易見，美國反動派心目中的民主是這樣的，即『破壞活動』是指一切反對種族歧視的人們，一切把北大西洋公約認作準備發動反對蘇聯、反對各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的新戰爭的公約的人們，一切把『馬歇爾計劃』看作奴役其他民族的人們底活動而言。假

若在調查所謂「破壞活動」的過程中，連一點岔子都找不出來的話，但他們還是認為這裏有『非法活動』份子。例如，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伊利諾斯州司濱林費爾特城的勃勞依爾斯委員會（以該委員會主席共和黨議員保羅·勃勞依爾斯的名字命名）公佈了一個報告書，在書內說：『在這兩個學校內並未發現有任何破壞活動，但在調查過程中，却找出了一種被認為是非法的活動。』因此，勃勞依爾斯委員會提請從學校中開除那些拒絕承認是共產黨員的大學生，開除那些拒絕退出所謂『破壞團體』的教授，撤換那些拒絕開除不可靠的教授的學校領導人。

對於學校教師及大學教授們，在美國已創立了一種局面，即他們不能對財閥統治集團作任何批評或非難。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由二十位反動教育家聯名發表了一個報告書，這些反動教育家包括哈佛大學校長傑姆士·康奈脫、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艾森豪威爾將軍、紐約中等學校的學監威廉士·楊生等人。從此以後，此種使人窒息的局面變成了完全無法使人忍耐的局面了。這個報告書帶着一個偽飾的名稱：『美國的教育與國際的摩擦。』該報告書的作者們首先偽善地斷言說，應維護國際和平，但和平的聲調很快地就轉變為贊武者的聲調。報告書却說，美國目前遭受侵略威脅，而戰爭的威脅却『要求

全體美國人民根本改變心理上的態度」。據這個文件的作者們的意見，美國教育家的任務是在於「幫助美國人民解答問題，問題並不在於我們要不要和平，而在於什麼是可以忍耐的，什麼是不可以忍耐的，假如我們要維護和平的話」。

反動份子要求從學校和大學中開除懷有進步思想的教師，首先開除共產主義者，作為醫治一切禍害的萬應藥。

這個報告書發表之後，加里福尼亞大學的管理委員會隨即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發表通告，自七月一日起，該校教師必須宣誓效忠美國現政府，並放棄一切為自己的權利而進行的鬥爭，反對宣誓者將被解除職務。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在佛羅里達州塔拉哈西城宣告成立州立法會議附設的專為調查各大學及專科學校的「破壞活動」的特種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特將專門調查表分送各校教師，表內不僅載有屬於何黨何派等問題，而且還載有例如這樣的問題：「你曾否反對過佛羅里達州的種族歧視法案？」

無論華爾街的壟斷資本家及其走狗們怎樣努力在恐嚇全體人民，特別是恐嚇知識份子，但是謊言與挑撥從來亦沒有幫過誰的忙。美國的進步力量為反對反動派而進行着鬥

爭。美國輿論對於反動派的迫害不能袖手旁觀。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加里福尼亞大學五百位教師在大會上通過了反對強迫他們宣誓效忠的決議。

以「費·陶塔·卡洛」名稱著稱的美國有勢力的大學生團體，於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公佈了反對宣誓效忠的抗議書。該抗議書說：「假若要強迫教師宣誓效忠，而其他職業的人們則可以不必如此，或者由不屬於該業的外界人士來調查教師職業上的資格和忠誠，那麼這將對教師和大學生雙方的精神方面起不良的影響。」

哈佛大學學生報『克里姆森』在保衛教師的權利上採取了更堅決的立場。該報在社論中聲明：「我們認為，共產黨員的身份，不見得就會自動地使任何人不適於執行教師職務。」

『指南針日報』評論員詹寧士·貝里發表了能代表許多美國進步知識份子的意見。他聲稱教師們是完全站在正義的立場，他們對於那種說他們好像能叛逆的毫無意義的假定，表示非常憤慨，要他們宣誓效忠就是懷疑他們有「叛逆」嫌疑。貝里提醒美國的教師們說，他們並非孤獨無援，職工會的活動家和全國各地的職員們做他們的後盾。在譏笑那無意義的藉口，說什麼宣誓效忠會有魔力可以挽救美國避免遭受「破壞活動」的時

候，貝里提議於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美國獨立紀念日）中午所有的美國人民不分男女老少大家同時宣誓，聲明不屬於任何企圖用暴力顛覆美國政府的團體。他聲稱，這樣一來，由於這種「有魔力」的儀式，不但僅僅是些教師、辦公廳人員和原子學者，而是所有一切的美國人都將變成可靠的人了。

共產黨的「工人日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的社論中號召美國的父母們來保衛自己的孩子。在指出艾森豪威爾參與起草該報告書，書內提議「肅清」美國學校裏的共產主義者時，該報說：『從一九四四年起，艾森豪威爾改變了很多。他在自己的著作和廣播演講等等上面掙了百萬以上的財富。在工業家和銀行家的贊助下，他保護着企業家的自由活動。現在艾森豪威爾將軍號召肅清美國學校內的共產主義者……艾森豪威爾和康奈特在報告書內硬說共產主義者的教師不會教真理，這是謠言。馬克思主義教導愛國主義和愛祖國。但這和愛戰爭、愛利潤或者愛華爾街所謂「企業家的自由活動」則毫無共同之點。假若信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底人們不能在我們學校內執教，那麼就應把我們的教師排列成行，塞住他們的口，強迫他們走鵝步，這樣一來就可把他們變成反動哲學和軍事宣傳的傳達者了。』

美國學校不僅是資產階級用來麻醉勞動人民的工具。它愈來愈益軍國主義化了，尤其在實施了強制軍事訓練之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間杜魯門設立了一個審查普遍軍事訓練問題的公民諮詢委員會。過了不久，杜魯門發覺這個名稱不妥，留有痕跡，因此就說：「我想把你們的組織改稱為總統府附設的普遍訓練顧問委員會。我要把『軍事』兩字取消。」

就在這次演說中杜魯門被迫承認，「應徵入伍的青年中，體力上或思想上不及格者佔百分之三十……」。杜魯門提議實施教育軍事化和學校軍國主義化，作為挽救體力上思想上不及格幾乎佔三分之一的戰時應徵入伍青年底「澈底」辦法。據他的意見，「為了保證我們的統治方式的繼續生存起見，」這是必需的。

杜魯門說：「我想使我們的青年獲得一種知識，使他們知道我們的政府是什麼？它有何種意義？它的義務是那些？我認為實現這個理想的最好辦法是在乎實施普遍訓練。」這指的是何種訓練？總統不願把它稱做軍事訓練。可是陸軍部却對這個問題說得很明顯，它說，軍事訓練「創立了提高我國青年教育水準的良好條件」。

美國教育家費茨柏脫里克在『全國範圍內對教育事業的損害』一篇文章裏坦白聲稱：『當公民諮詢委員會成立時，我們心目中祇有想到軍事訓練而已。我們心目中沒有想到任何在普遍教育或社會主義實驗方面的訓練。我們心目中沒有想到體格訓練或衛生訓練，亦沒有想到職業訓練，當然，那些屬於軍事訓練的組成部份者則屬例外。不論你是學者，是行政管理人員，是軍人，軍事訓練是教導你們殺人的技術。』

美國的戰爭販子，利用一切方法來鞏固軍閥的統治，來奪取世界霸權。亨利·華萊士聲稱，在和平時期金融家在學校內實施強制軍事訓練，『其目的想在我國國內建立一個美國版的警察國家，作為奪取世界霸權的必要的先決條件』。

美國教育的整個系統正在軍國主義化了。祇要指出杜魯門政府於一九四八年在大學生的軍訓經費上化了一億元這一點就够了。軍事歇斯特里症強烈地擴展到了全國各地，從小學生起到老年人止的一切年齡的人們都在受着這種軍訓。

A·A·日丹諾夫在數國共產黨的代表會議席上說：『美國擴張主義者集團在夢想着發動新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們十分關心想用沙文主義或軍國主義的毒藥來毒殺政治落後而文化不足的美國一般民衆，他們通過電影、無線電、教堂及刊物等等工